

解。縱使劉先生「微近中年」(一二頁)，哀樂時時，不吐不快，畢竟個人「殘生」有限，等閒也禁不起如此「絢爛的浪費」(一七一頁)。(顏獨)

疎燈自照孤宿帆

談「二殘雜記」·二殘(劉紹銘)著

民國六十五年三月·四季出版公司印行

目前一般人對於這類無關「經國濟世大業」的文字，總喜歡以「雜文」這種籠統的名目去加以規範，於是乎散文、雜文、小品文乃至方塊文章居然混淆一氣，剪不斷理還亂，老讓人覺得丹屏、楊子、姑隱、二殘或者那個老美包可華，都可以在「雜文界」平起平坐。爲了避免重蹈兒時解「雞兔同籠」這類應用題時候的噩夢，我想我們還是直截地把二殘——劉紹銘先生歸納回文學的領域裏來罷。對劉紹銘先生此等「不成體統」的「雜文」，我寧願以小品文(Essay)視之。因爲它雖然既短且雜，畢竟還是一種性情文章，非要性情中人，方才寫得出來。

小品文的開山老祖——法人蒙田，在他一五八〇年初刊小品文集的序裏，曾表明過他寫作小品的態度：「我的短處可以全盤托出，我的真相，在社會儀尚所允許的範圍以內，可以赤裸裸地畢露出來。」因此，我覺得讀劉先生的小品，最大的樂趣倒還不是他行文的恣意酣暢，使那些僵硬了，用濫了的辭句在先生的筆下，重新得到「肉白骨」的功德，而係隱藏在文字背後，「此中有人，呼之欲出」性格，隱隱約約地閃爍著劉先生在做學問之外的另一面。

且不論這冊「雜記」裏頭的文章，的確如劉先生所言「顯明易懂，一目瞭然」，但是真地「不含半點玄機」嗎？事實上，劉先生雖然寓居海外多年，但是他們所關心的絕大部份還是此地的文學及此地的社會，誠然，劉先生也患得了一種叫「Obsession With China」的相思病，同夏濟安先生是一樣的症狀，委實很令人貼心的事。在「犬儒主義」一文中，劉先生寫道：「對天、對地、對國家、對民族、對人、對事、對父母兄弟朋友——我們得保持一種宗教式的虔誠。不是爲了別人，而是爲了自己：只有對生命有著若干基本虔誠態度的人，才能在這個瘋狂的世界中保持

清醒。」

誰又能說這不正是劉紹銘先生的夫子自道呢？

J. B. Priestley 說：「小品文就是小品文家的作品。」真是一語中的，也許中國人對於「小品文家」(Essayist)沒有什麼具體的概念，但是我可以告訴您：讀劉紹銘先生的小品要比讀他那「嘖嘖打完後仍然不快樂」的小說——「烈女」來得有趣得多，因為可以說劉紹銘先生和他的二殘，正是文如其人，不折不扣的「小品文家」。他是二十世紀中國的新儒。(林同森)

作者的影子

讀「削瘦的靈魂」·七等生著

民國六十五年十月·遠景出版社印行

有人曾武斷說，幾乎所有的文學作品，都可以捕捉到作者本人的影子。換句話說。就是作者把自己當作模特兒。但是這種作品，表達成功的例子並不多見。因為作者也和普通人一樣，要了解自己並非易事，

何況縱然了解自己的缺點，要全部表露無遺，那除了勇氣決心外，還要有對藝術的真誠。而作者一旦要描繪自己，普通不外採取兩種方式，一種是誇大自己如何如何的完美；一種是運用冷嘲熱諷的筆調，把自己批評得體無完膚。但是兩者都不夠真實。

七等生的新作「削瘦的靈魂」，便是自剖式的作品，顯然也淪患那種「誇大自己如何如何的完美」的嚴重弊病。七等生，本名劉武雄，是一個我行我素的作家，他很少去關注批評家對他的褒貶。祇要不是至解得太離譜，縱然對他有不解或誤解，他也是始終條持冷漠。他認為作品就是最好的證明和答覆。手頭就有他的「僵局」、「我愛黑眼珠」、「巨蟹集」、「放生鼠」、「離城記」、「來到小鎮的亞茲別」、「沙河悲歌」和「隱遁者」。除「沙河悲歌」或多或少有影射自己外，他作品的風格都大同小異。而他的題材，和表達方式，跟時下一般作家又大異其趣。褒者譽為中國的「卡夫卡」，而貶者又損為「小兒麻痺的文體」、「連中文寫作能力都有問題的作家」。

七等生在「削瘦的靈魂」引朗介納斯說的話：「只有藝術才能告訴我們，有一些表達方式完全是屬於